

# 初探川普的大戰略——牧師、捐客、還是惡霸？\*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 大戰略的定義

儘管大家朗朗上口大戰略，連英文版維基百科都有條目介紹<sup>1</sup>（Wikipedia, 2018: Grand Strategy），然而，對於這個概念並沒有共識，更不用說一言九鼎的定義（Silove, 2018: 28-29, 32; Berindan, 2017: 1）。狹義的戰略（strategy）是以軍事力量來達成政治目的（Gray, 1982a: 1），譬如克勞塞維茨（von Clausewitz, 1968: 173）認為戰略是有關如何運用戰鬥來贏得戰爭的理論<sup>2</sup>，李德哈特（Liddell Hart, 1974: 321）則擴充將戰略定義為分配及使用軍事手段以達成政策目標的藝術，依然侷限於軍事戰略（military strategy）。廣義的戰略則是使用手段來達成特定目標（Buzan, 1987: 3），因此，在軍事以外的場域也可以看到戰略的運用，有別於強調採用方法的戰術（tactic）。介於兩者之間的是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用來解決國家在軍事、政治、及經濟等層面所面對的國家安全威脅，因此又稱為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或國家大戰略（national grand strategy），也就是大戰略（grand strategy）<sup>3</sup>。

一直到 1980 年代為止，國際關係學者所關注的是各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美國的外交政策<sup>4</sup>，相關的專門領域是比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或稱外交決策分析（foreign policy making）；等到冷戰結束，學界、以及實務界

---

\* 發表於台灣國際戰略學會主辦「台灣國際戰略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科技與工程學院 3 樓會議室 2018/11/17。

<sup>1</sup> 漢文版只有簡單不到兩行；「大戰略又稱為高戰略（high strategy），以「有目的的運用所有一個安全共同體能運用的權力手段」來利用國家整體資源的總體戰略」（維基百科，2018：大戰略）。

<sup>2</sup> 意思是說戰術用來贏得戰鬥（或戰役）、戰略則是用來贏得戰爭。原文是：Tactics is *the theory of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s in combat*. Strategy is *the theory of the use of combats for the object of the War*.

<sup>3</sup> 大戰略的概念在二次大戰期間開始出現，尤其是同盟國如何擊敗軸心國的大戰略，戰後，這個名詞漸漸被國家戰略所取代，這幾個名詞的意思相近（Huntington, 1991: 12）。

<sup>4</sup> 譬如 Oye 等人（1983）、以及 Lieber（1997）。

則轉向所謂的大戰略<sup>5</sup>，彷彿呼應 Paul Kennedy 在 1992 年所出版的《戰爭與和平的大戰略》(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 (Silove, 2018: 27)。不過，Huntington (1991: 11-12) 指出，大戰略並不等於外交政策，兩者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所要面對的只是對手，而後者所要著手的是在面對外部環境之際、要如何採取手段來達成目標，未必是針對特定的敵人。

由抽象到具體來看，大戰略可以視為大原則 ( grand strategy as an organizing principle )、計畫( grand strategy as a plan )、或是行為模式( grand strategy as a pattern of behavior )；由於戰略的基本構成包括手段及目標，而大戰略的概念又是由戰略衍生而來，因此，不管是大計畫、大原則、還是大行為，一定要有目標、以及手段兩個部分，只不過，有些可能會比較強調目標，有些則比較強調手段 (Silove, 2018: 45)。合理推論，大原則應該是會比較著重目標，大行為會比較重視手段，而大計畫應該是會介於兩者之間。我們整理 Silove (2018) 的看法如下：

(一) 大戰略作為有條理的原則 (Silove, 2018: 39-42)：在冷戰之前，大戰略往往指涉的是大計畫，有如食譜、或是藍圖；在冷戰後，大戰略通常意味著總體的原則、架構、基本戰略觀、關鍵的考量、首要的外交信條、或是決策者共有的理念<sup>6</sup>。一般而言，這種大原則可以來自國家領導者的理念<sup>7</sup>，譬如美國第六任總統亞當斯 (John Quincy Adams, 1825-29) 揭櫫的「內部團結、外交中立」(unity at home and neutrality in foreign policy)<sup>8</sup>；另外，這種大原則也可以來自國際關係學者的倡議，內容通常包含對於國際政治的基本假定、國家的企圖、以及偏好的政治及軍事手段。

(二) 大戰略作為計畫 (Silove, 2018: 34-39)：顧名思義，大戰略是位階最高的計畫 (grand plan)，這是最傳統的理解，譬如名戰略學家李德哈特 (Liddell

<sup>5</sup> 譬如 Lynn-Jones 與 Miller (1992)、以及 Brown 等人 (1997)。

<sup>6</sup> 參見 Legro (2005: 8-10) 把強權的大戰略分為三大抽象的理念，修正主義 (revisionist)、分離主義 (separatist)、以及整合主義 (integrationist)。

<sup>7</sup> Silove (2018: 31-32) 指出，要知道政治人物的基本戰略觀，不外聽其言、觀其行，前者是指直接檢視其提出來的目標、及手段，後者則是由行動來推斷，畢竟，有些想法是不說自明，譬如軍事預算。

<sup>8</sup> 又如「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 (Gurtov, 2006; Gurtov & Van Ness, 2005)。

Hart) 研究戰略大師克勞塞維茲之際，他所認知的最高軍事指導原則，就是把大戰略當作精心的整體作戰計畫 (master plan)，動員所有資源、用來贏得戰爭、確保國家的生存。在這樣的認識下，大戰略不是政策，因為後者的重點在目標，而前者的用意在確認目標後、還要決定採取何種政治及軍事行動；因此，大戰略是「政策的執行」(policy in action)，而非基本政策 (fundamental policy)<sup>9</sup>。

(三) 大戰略作為行為模式 (Silove, 2018: 43-45)：當我們看不到詳細的計畫、也聽不到宣示的大原則，這時候，可以觀察得到的行為模式就是大戰略，尤其是在「可以作、不可以說」的情況下，國家如何運用所有的軍力、外交、及情報等資源跟其他國家互動，那麼，持續的行為模式就是大戰略；一些學者認為這些行為模式背後是否有意圖並不重要，有些則相信可以找出背後所隱藏的意圖，當然也有人以為，儘管無法由言行識別出蛛絲馬跡，國家的行為的背後還是有其戰略文化。

事實上，大戰略除了是多層次 (multi-tier)、也是多面向 (multidimensional) 的概念。Silove (2018: 45-47) 認為，大戰略既然號稱是「大」，就時間的面向而言，不能且戰且走，至少也要比單一外交事件所涵蓋的時間較長；此外就廣度而言，大戰略異於一般的戰略，涵蓋的應該是整體的 (holistic) 治國之道範疇，包括軍事、外交、及經濟；再來，大戰略所關心的應該是重大的國家利益，包括主權獨立、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及在國際上的權力地位；至於重要性而言，又可以區分為相當重要 (of large importance)、至關重要 (of vital importance)、以及極端重要 (of ultimate importance) (圖 1)。Kaufman 等人 (1991: 2-4) 進一步

---

<sup>9</sup> 我們最常見的大戰略是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這是根據國會在雷根總統 (Ronald Reagan, 1981-89) 任內所通過的 *Goldwater-Nichols Defense Department Reorganization Act* (1986)，美國總統必須每年向國會提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SS Report)，向外國、及國民說明行政部門的整體戰略觀，以便整合國家的外交、及國防政策，包括要如何加以執行、如何嚇阻侵略行為，尤其是在新總統上任之際，可以讓大家都清楚美國在世界上的重大安全利益、目標、及目的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n.d.; Wikipedia, 201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United States))。最早的一本是由雷根在 1987 年所提出，最新的一本則是川普在 2017 年提出的 (White House, 1987, 2017)。

指出，大戰略應該包含國家所處的脈絡（內外環境<sup>10</sup>）、面對的威脅（對手的動機、及實力）、追求的目標（國家利益）、及可以動用的手段或資源（軍事、外交、經濟、情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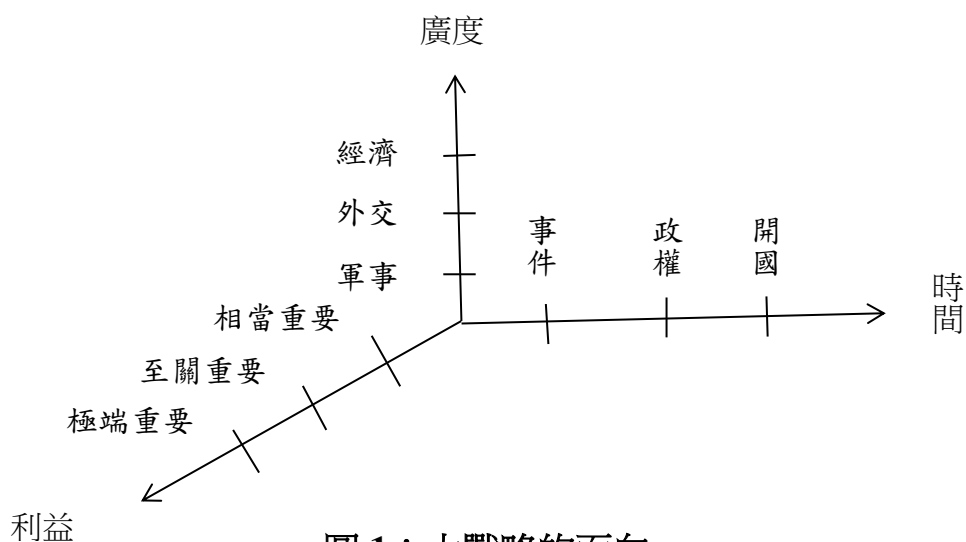


圖 1：大戰略的面向

其實，除了最根本的什麼是大戰略（what），相關的課題還包括這是哪種國家的大戰略（who）、如何解釋大戰略的出現（why）、要如何來執行（how）、以及為了達成哪些目標（for what）或是有何影響（what effects）。Silove (2018: 31) 根據科學研究的三大任務，也就是觀察、解釋、及規範，針對大戰略這個研究對象（object），細分為究竟有沒有（has had）、為何會有（can have）、及是否應該要有（should have），也就是大戰略的存在（existence）、影響（effects）、以及可欲性（desirability）。

## 大戰略的研究

在美國的對外關係，外交理念往往以特定總統命名，譬如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1850*）宣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有些外交政策雖未直接提及、卻仍然則可以聯想到總統的名字，譬如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sup>10</sup> 所謂的內部環境包括政治文化、國家價值、以及政治體系（Kaufman, et al.: 1991）。

1901-1909) 所採取的巨棒外交 (Big Stick Diplomacy)，或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1933-45) 對拉丁美洲國家示好的睦鄰政策 (Good Neighbor Policy)。這些以人名來命名的主義，大體是指美國的外交傾向、或是具體的外交作為，當然，也有不乏比較抽象的大原則，譬如杜魯門主義 (Truman Doctrine, 1947) 會讓人聯想到針對共產陣營的圍堵政策 (containment)，大家耳熟能詳。

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大戰略的研究，大體上來自國際關係、比較外交政策、以及戰略研究等三個學術領域<sup>11</sup> (圖 2)。Dueck (2004: 214) 檢視現有文獻，認為這些研究的最大缺點在侷限於描述，尤其是美國大戰略的持續、或變遷，未能著手解釋為何會進行調整，更不用說進一步預測可能改變的模式；就因果關係而言，回到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大途徑，如果說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分別相信權力、利益、以及理念的解釋力，他問道，究竟三者之間是互斥、或互補？如果是後者，到底要如何進行合成？同樣地，採取建構主義的 Nau (2002) 也強調合成的重要性，認為必須同時考量權力、以及理念；他發現美國的大戰略之所以會搖擺不定，主要是因為未能跟其他成熟的民主國家肝膽相照，因此建議美國在決定與特定國家周旋之際，不能光比拳頭大小、還要看是否能沆瀣一氣<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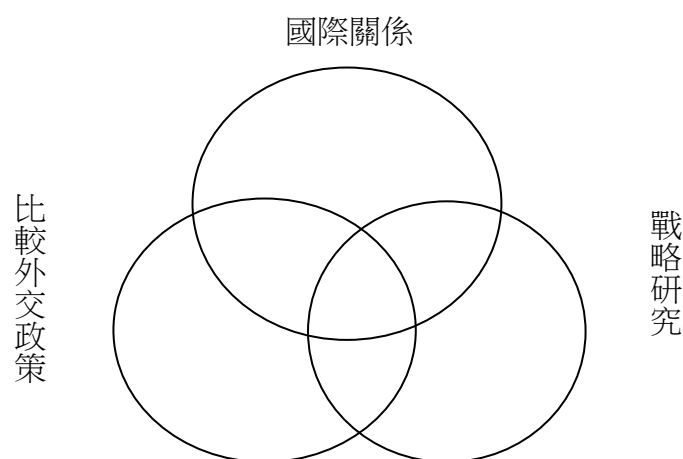


圖 2：大戰略所跨越的學術領域

<sup>11</sup> 比較 Kitchen (2010: 121) 的說法，大戰略是國家安全與外交的交集。

<sup>12</sup> 表面上看來，他似乎比較傾向於自由主義，也就是認同民主的價值，然而，臭味相投、一鼻子出氣，未必都基於價值，也有可能血緣歷史文化。

不過，Legro (2005: 3-4, 179-81) 提醒，即使把可能影響強權大戰略的因素都找出來了，未必能提供有效解釋，畢竟，把所有的食材放進調理機攪拌，並不代表就可以煮出佳餚，還必須要從事解釋的合成 (synthetic explanation)。假使將內部因素比喻為蔬菜、外部因素比喻為水果，究竟彼此之間如何互動、到底有何特別的調和機制，他並沒清楚解釋，只比喻人在拿咖啡杯之際，權力是肌肉、利益是手，而理念才是大腦 (p. 14)。這樣的鋪陳方式，當然是比光會條列清單還好，然而，聽起來是認為理念重於權力、或利益，彷彿蒜頭的味道可以壓過其他的成分<sup>13</sup>，不能算是真正的合成。

大體而言，合成的方式可以有三種(施正鋒, 2015: 287-90): 首先是 Kazenstein 與 Okawara (2001) 建議採取所謂「折衷」(eclectic) 的途徑，認為在面對不同的場域之際，同時可以並用不同的途徑<sup>14</sup>，譬如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宛如羅馬神話中的雙面神雅努斯 (Janus); 第二種合成方式是從事並置整合，譬如 Nau (2003: 220-21) 嘗試結合現實主義及建構主義，以認同、及權力兩個面向建構四大 (2x2) 象限，因此可以有四種大戰略選項；第三種則是依據國際關係的三大途徑，將國家的外交大戰略，由敵對到友好以光譜的方式呈現出來，譬如 Goldstein (2003: 59-60) 依據現實主義、建構主義、及自由主義，認為西方國家對中國可以有不同的對策，問題是看不出選擇調整大戰略的動力何在。

我們先前曾經採取 Johnston (1999) 的認同現實主義 (identity realism) 途徑，揉合建構主義、及現實主義 (或說披著建構主義外衣的現實主義)，以比較外交政策的途徑，來著手合成大戰略的解釋 (圖 3): 依據建構主義的認識，決策者及國民自我認同與理念形成了一個認知的過濾網，用來篩選現實主義所重視的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國力、或威脅，及自由主義所強調的經濟利益、及國際制度或是規約; 在這裡，直接左右國家大戰略的是現實上的權力考慮，至於經濟利益、或是國際制度，雖然會強化、或弱化上述的因果關係，也就是提供機會、或是限

---

<sup>13</sup> 敝帚自珍，正如建構主義者認為物質能力不重要，現實主義者以為信理念無關宏旨 (Kitchen, 2010: 123)。

<sup>14</sup> 這個途徑能否成功，端賴是否能成功進行市場分割，也就是生意歸生意、朋友歸朋友。

制，實質上並沒有獨立的解釋效用，頂多算是中介變數<sup>15</sup>（施正鋒，2015：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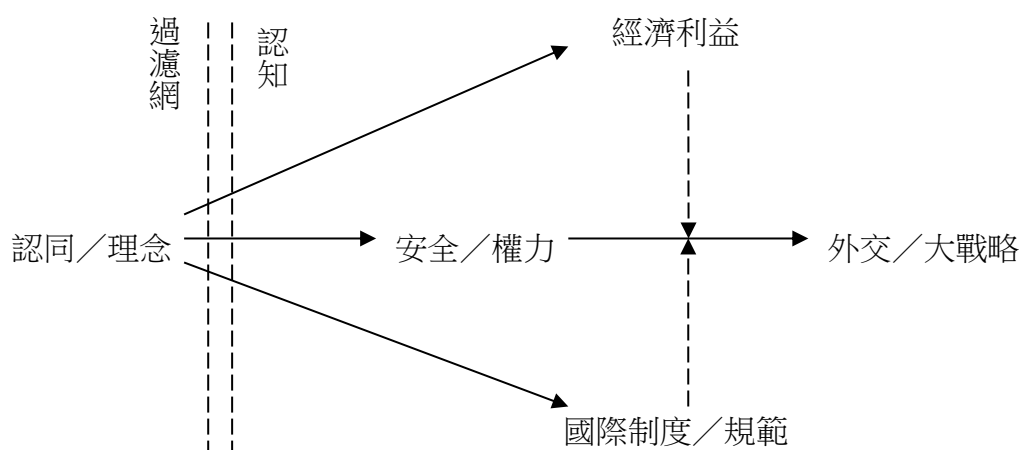


圖 3：影響國家大戰略的因素

我們接著依循 Kang (2007: 21) 的作法，先由建構主義出發，以是否懼怕潛在的敵人作為認同的關鍵組成，拿來當作國家進行大戰略選擇的依據；一旦透過與他國互動、及自我反思來建構自己的認同以後，國家大戰略的決定還是要與自由主義、以及現實主義的對話，在光譜上的兩個極端（經濟獲利、及軍事準備）間，有支配/抗衡、交往/避險、孤立/調適、及合作/投好等四種大戰略選項；換句話說，究竟大戰略會往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調整，關鍵在於建構主義。我們認為，這樣子的合成，才算真正地在從事解釋（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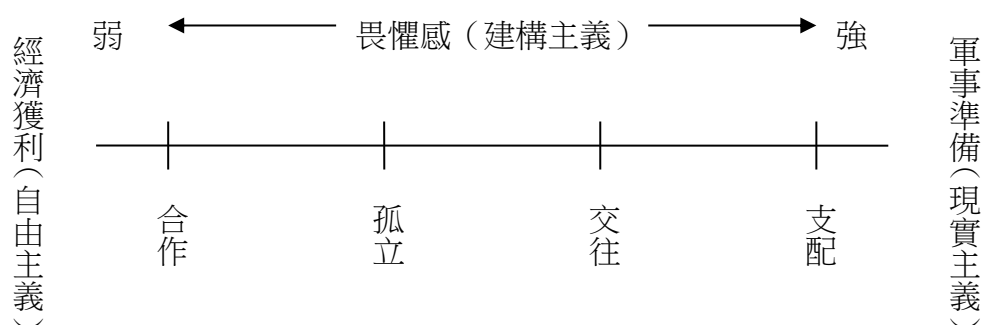


圖 4：大戰略選項的光譜

<sup>15</sup> 中介變數的意思是說這些變數是次要的，而體系的變動才是關鍵的。有關於三大主義與三個分析層級的關係 (level of analysis)，也就是個人 (決策者的特色)、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國際體系，特別是第二層級，究竟是由內到外、由外到內、還是彼此相互建構，請進一步見施正鋒 (2015: 290-94)、並參考 Kitchen (2010: 118)

## 戰後美國的大戰略

美國得天獨厚，在地緣政治上受到大西洋、以及太平洋的庇佑，得以自外於歐洲及亞洲的紛擾。從 1776 年獨立建國到 1941 年加入二次大戰為止，美國長期採取中立政策 (neutrality)，在兩次世界大戰，最後都是無端被捲入強權的爭鬥；事實上，由一次大戰結束到二次大戰爆發，美國瀰漫孤立主義 (isolationism)，除了自由貿易，對於國際事務意興闌珊。不過，當美國與蘇聯的軍隊在易北河 (Elbe River) 會師，不僅象徵著兩個世界強權的分庭抗禮，也打破十九世紀中以來的國際體系，美國當仁不讓 (Nerlich, 1979: 92)。

美國獨立之初周旋於英國、法國、及西班牙等海上強權，對於軍事同盟法國虛與委蛇；華盛頓總統 (George Washington, 1789-97) 在告別感言 (1796) 還告誡國人，小國依戀大國是自貶為衛星國家。進入十九世紀，美國的要務是擴張北美洲大陸、鞏固西半球，大致上與歐洲強權相安無事。南北戰爭 (1861-65) 後，美國休養生息，海外迎頭趕上的重心在擴展貿易、不在積極建立殖民地，在商言商，艦艇只是保護商機的後盾。美國在美西戰爭 (1898) 後取得西班牙所屬菲律賓、關島、及波多黎各，算是防衛性擴張主義，蔚為新興的強權。美國在甲午戰爭 (1894) 倚懸山看馬相踢倚，事不關己，到了日俄戰爭 (1904-1905)，美國出面斡旋，開始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囿於孤立主義的傳統，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始於中立，終究以平衡者 (balancer) 之姿扮演關鍵的角色。

美國在戰後趁著國際政治權力真空頭角崢嶸，原初的構想是憑藉金融及經濟實力、加上政治及外交影響力，透過多邊國際組織來取得優勢 (preponderance)；等到中共贏得內戰、蘇聯成功引爆原子彈、以及韓戰爆發，美國不再溫良恭儉讓，就毫不客氣發揮軍事優勢來執行控制國際體系的大戰略，一方面防止潛在的敵對挑戰者出現，另一方面把美國的安全建立在經濟上的相互倚賴 (Layne, 1998: 9; Ikenberry, 2005: 133-35)。Cooper (1972-73: 19, 29) 把美國戰後採行貿易與外交分離的作法稱為雙軌制度 (two-track system)，也就是 Nerlich (1979: 93) 所謂



的經濟的去政治化、及軍事的政治化，聽起來有幾分兩手策略的味道。

在冷戰時期（1947-91），美國的作法是自我定位為正義凜然的霸主，透過防衛條約提供軍事保證，以延伸嚇阻（*extended deterrence*）對共產陣營進行全球性的圍堵（*containment*），一方面幫忙當地政權處理政治騷動來取得支配，另一方面則透過自由貿易製造彼此的經濟互賴，保證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終究獲致世界和平（圖 5）（Layne, 1998: 11-13）。以西歐為例，美國透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片面保障成員的安全與獨立，扮演宛如鎮靜劑（*pacifier*<sup>16</sup>）般的保護者角色（Joffe, 1984: 66-67）。美國跟盟國曉以大義，自己是大善人、不是黃鼠狼，只會制衡威脅者、不用怕，而且大哥還會分享利益給小弟，既然沒有其他更好的安排，大家對於結盟趨之若鶩、團結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話又說回來，美國一方面驅策日本、以及德國分別抗衡中國、及蘇聯，另一方面又唯恐他們進行「再國家化」（*renationalization*）、進而坐大發展為不受節制的第三勢力，戒慎小心，也就是採取所謂的「雙重圍堵<sup>17</sup>」（*double containment*）（圖 6）（Layne, 1998: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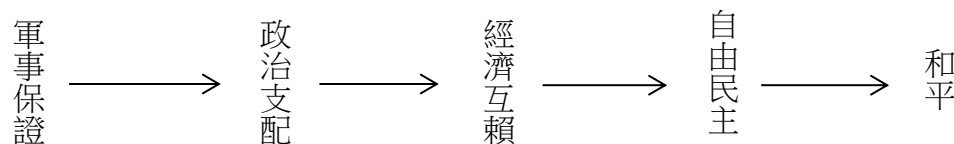


圖 5：戰後美國優勢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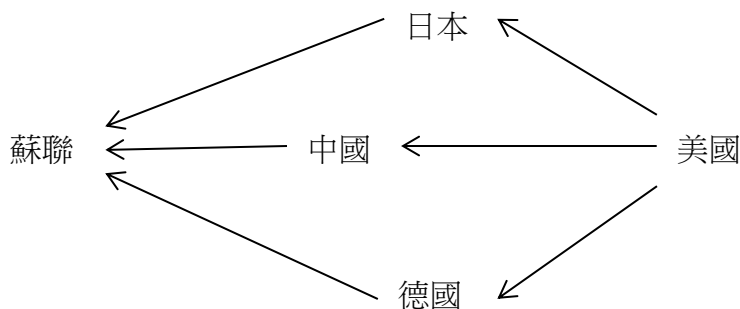


圖 6：冷戰中美國的雙重圍堵

<sup>16</sup> 這是源自 Nerlich（1979: 88）對於美國戰後在西歐角色的描述，既為 *pacifier*、又為保護者。當然，這可以翻譯為鎮靜劑，也可以直譯為嬰兒的奶嘴，一語雙關、充滿無限想像。

<sup>17</sup> 請比較「雙圍堵」（*dual containment*），譬如美國在柯林頓總統（Bill Clinton, 1993-2001）時同時對付伊朗、及伊拉克，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 2009-17）疲於奔命利比亞、及敘利亞（Mearsheimer & Walt, 2016: 76）。

美國原本偏好的是離岸／海上制衡（offshore balancing），也就是透過軍事結盟來圍堵蘇聯的擴張，只不過，當地的代理人政權始終無力有效圍堵，只好採取陸地制衡（onshore balancing），也就是派軍進駐、甚至於加入戰局來恢復區域性的均勢平衡（balance of power），特別是韓戰，畢竟美國不是吃素的（Mearsheimer & Walt, 2016: 73, 75）。然而，由於逐漸面對沈重的軍費，美國對西歐的搭便車的現象出現雜音，對於彼此安全的合作或糾纏有所保留，希望對方多出點力，甚至口出惡言視之為安全的寄生（security parasitism）（Joffe, 1984: 64, 73; Mearsheimer & Walt, 2016: 73-75）。不管如何，一直到冷戰結束，美國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 冷戰結束後的美國大戰略

冷戰結束，美國挾其政治、經濟、軍事、技術、以及文化上的優勢，一躍為舉世無雙的超強，躊躇滿志；延續冷戰時期的架構，美國透過延伸嚇阻提供軍事保護、同時以鬆散的多邊安排維繫經貿關係，前者建立在現實主義的基礎、後者則帶著自由主義的色彩；盟邦之間投桃報李，美國儼然就是國際社會公共財的生產者，形同非正式的帝國（informal empire），就不用再擔心會有強力的反制出現（Ikenberry, 2005: 133-40; 2006）。

美國一開頭短暫經歷所謂「獨霸的時刻」（unipolar moment），照說是難以維持的，為何沒有看到結構式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所預測的均勢平衡？換句話說，為什麼並沒有一股強大的力量結合起來對抗美國的霸權？為何兩極的（bipolar）國際體系並未出現，而多極的（multipolar）世界秩序似乎呼之欲出？自由主義的觀點是，美國傳統上是一個不情願的霸主（reluctant hegemon），本質上是善良（benign）而又自制，因此，除了政治自由薄弱的中國，其他強權認為沒有必要跟美國互別苗頭；相對地，現實主義者則以為，關鍵在於美國太強大了，既然反制的成本過高，倒不如大家乾脆都加入美國所支配的霸業，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西瓜倚大邊（bandwagon）（Dueck, 2004: 197-200）。

話又說回來，美國既然不用玩危險的戰略對立、或均勢平衡遊戲，同盟關係就沒有先前那麼緊密，因此，權力實際上是受到國際制度約束著 (Ikenberry, 2005: 139)。換句話說，與其說是維繫過去的「均衡下的和平」(peace of equilibrium)，倒不如說這是「霸權下的和平」(hegemonic peace)，那麼，而美國所推動的國際秩序就可以美化為合作式的安全 (cooperative security)；在這同時，由於過去面對蘇聯的前線國家已經不再飽受威脅，而非國家的恐怖主義高漲，也就是所謂的「戰爭／安全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war/security)，安全合作的誘因不免大為削弱，美國徬徨於雙邊主義、及多邊主義之間 (Ikenberry, 2005: 142-49)。

蘇聯在 1991 年解體，美國拔劍四顧心茫然，重新思索自己的大戰略。老布希總統 (George H. W. Bush, 1989-93) 主張美國有責任抓住史無前例的契機，運用本身的道德、及物質資源，疾呼致力建構一個跟自己的價值及利益相符的國際新秩序 (new world order)；柯林頓總統沿襲舊制，不免裹著所謂「人性的面貌」(human face)，強調民主價值、及多邊主義；小布希總統 (George W. Bush, 2001-2009) 揭橥美國主導 (American primacy)、及自由的價值，九一一事件更讓美國深信武力的重要性，由於好大喜功、戰術蹩腳，終究陷於伊拉克、及阿富汗的泥淖，又無力處理全球金融危機；歐巴馬總統上台之際，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悄悄地崛起，又必須周旋於利比亞、及敘利亞的戰事，他對美國的衰退有自知之明，省事事省，避免戰線拉太長，儘量不以兵力解決問題、偏好外交、及經濟手段 (Clarke & Ricketts, 2017)。

走過後冷戰的四分之一世紀，Brands (2018a) 回顧美國的大戰略，跟冷戰時期的作法相互比較，做了三項觀察：

(一) 蕭規曹隨 (pp. 2-6)：在冷戰時期，美國一方面以軍事部署、以及安全擔保，來獲致有利的全球均勢平衡、確保盟邦的穩定，不止要圍堵、甚至於要打敗蘇聯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另一方面則領導國際貿易制度的建立；在後冷戰時期，美國儘管面對新的挑戰，譬如國際恐怖主義、核武擴散、流氓國家的挑釁、或是區域衝突，卻依然明顯保有在軍事、經濟、及外交上的主導；因此，大

戰略的目標大同小異，也就是透過關鍵區域的均勢平衡來保有美國的主導，頂多只是多了一些彩妝亮點，基本上是行禮如儀、老生常談，條約照簽、生意照做。

(二) 瑕不掩瑜 (pp. 6-11)：儘管美國未必能心想事成，難免有所疏忽、或判斷錯誤，特別是在索馬利亞的戰事灰頭土臉、在利比亞的軍事介入又為德不卒，整體來看是正面的，就好像美國在冷戰時代於越戰稍有挫敗，然而，和平、穩定、及自由在相對上還是有進展，可見，美國採取的軍事亮相及結盟的大戰略，雖不滿意卻可以接受；特別是德國、以及日本言聽計從，不用擔心王子復仇，至於北韓、及伊朗的核武雖然令人厭煩，終究並非心頭大患；因此，與其大張旗鼓、推陳出新，不如趁機休養生息、見招拆招，等到多極體系真正出現再說。

(三) 寶刀未老 (pp. 11-16)：儘管美國相對的軍事、及經濟實力或許有降，主導性也不像冷戰時期那麼一言九鼎，特別是俄羅斯、以及中國不再韜光養晦，亟思如何主導區域，不時以軍力威嚇鄰國，目的是測試美國對周邊結盟體系的回應，讓人質疑美國的戰略清償能力 (strategic solvency)，當然威脅到美國的大哥地位、以及利益，特別是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戰事，美國左支右絀，令人擔心是否雄風不再、無力肆應呼之欲出的多極體系；然而，他認為在高端戰力投射上，美國還是具有對優勢，包括航空母艦、戰術飛機、核武潛艇、空中預警機、以及無人機，不管是在全球、或區域，當下躍躍欲試的中國還是不足以跟美國一決高下，因此，更談不上所謂的權力轉移 (power transition)，美國或可未雨綢繆，卻不應該輕言好聽的戰略撤守 (strategic retrenchment)。

其實，Posen (2014: 165-71) 發現，從柯林頓總統時期開始，當下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倡議者有相當大的共識，也就是美國主導與合作式安全兩大戰略已經聚合為一種自由式的霸權 (liberal hegemony)；儘管接任的小布希總統連任後全力擁抱自由式霸權，然而，當美國不再意氣風發，自由主義者認為機會已失、成本及風險增加，而現實主義者則對於到底要採取攻勢、還是防衛式結盟來圍堵，並沒有共識。基本上，Posen (2014: xi) 主張美國沒有必要維持自由式的霸權，因為適得其反、成本太高、以及浪費；他以為，美國如果要走出渾沌一片的大戰

略思維，應該聚焦少數的威脅、不要採取強硬的解決之道、也不要妄想改造世界，建議從事選擇性的交往<sup>18</sup>（selective engagement）、倡議採取自我克制（restraint）的大戰略就好。

Dueck（2004: 198, 209）也不認同小布希總統所採取的大戰略，也就是美國在全球的片面主導姿態，更不用說他對於新保守主義所大聲嚷嚷的消除流氓國家（rogue state rollback）調子相當不以為然。他認為由自由主義發軔<sup>19</sup>，可以有兩種大戰略的選擇，包括強權共治（great power concert）、及選擇性交往。同樣地，Art（2003）的選擇性交往雖然立足於現實主義，不過，他既反對美國通盤強勢主導、也駁斥新孤立主義的退卻，認為美國應該依據國家利益的重要性<sup>20</sup>，考慮成本、花最少的代價，採取選擇性的交往，沒有必要戰線拉太長、四處海外用兵當救火隊。Kupchan（2002）也有類似的看法，主張在多極的體系之下，美國應該重建國際主義、放棄主導全球，只要強權彼此對自由的規範及作法有共識，自我強化、量力而為，各自在勢力範圍維持和平；而 Dueck（2004: 205）還進一步主張，美國不應該一廂情願，還要看對方的態度，也就是說，大家必須有道德上的共識、而非刻意去凝聚。可以看出，不管交往（自由主義）、還是圍堵（現實主義），其實是有重疊的。

Kaufman 等人（1991）觀察到四種美國國家安全的大戰略選項，包括選擇性嚇阻（discriminate deterrence）、限制性圍堵（finite containment）、新孤立主義（new isolationism）、以及自由式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前者分別又稱為冷戰式國際主義（cold war internationalism）或全球圍堵（global containment）、有限圍堵（limited containment）或有限脫離（limited disengagement）、戰略獨立（strategic independence）、及理想主義式世界秩序（idealist world order）<sup>21</sup>。雖然他們沒有明說，大致上可以使用光譜的排序（ordinal）方式呈現如下（圖 7）：

---

<sup>18</sup> 或是有限交往（limited engagement）。

<sup>19</sup> 包含民主政府、開放市場、以及國際制度（Dueck, 2004: 211）。

<sup>20</sup> 見 Art（2003: 45-47）的重要（important）、相當重要（highly important）、及至關重要（vital）。

<sup>21</sup> Walt（1991: 136-38）認為在光譜的右邊，其實應該還有新保守主義所倡議的消除共產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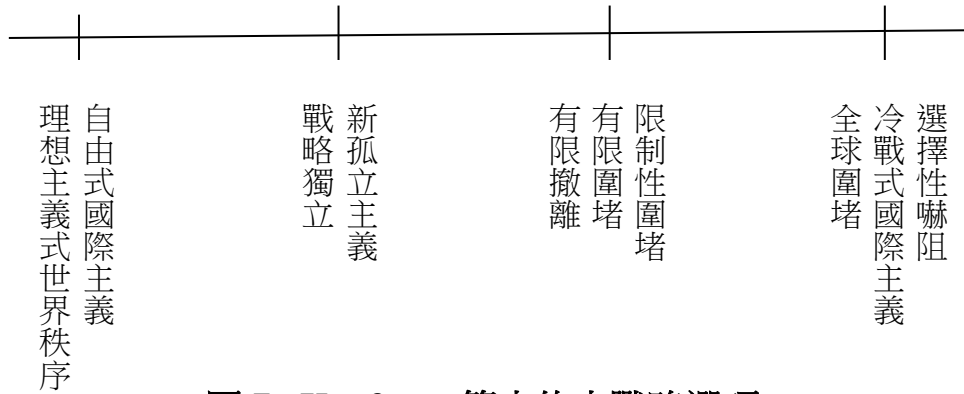


圖 7：Kaufman 等人的大戰略選項

Posen 與 Ross (1996-97) 也歸納出四種美國大戰略的願景 (圖 8)，由現實主義到自由主義，包括美國主導<sup>22</sup>、選擇性交往、新孤立主義、及合作式安全，大體呼應 Kaufman 等人 (1991) 的四大選項，只是名詞聽起來比較舒緩。同樣地，儘管 Posen 與 Ross (1996-97) 只是列舉，然而，大體還是可以依據強弱排序。我們注意到，兩人認為美國主導是現實主義的極大化、新孤立主義是現實主義的極小化，而選擇性交往採取的是傳統現實主義的均勢平衡、會選擇性從事人道干預，而新孤立主義則是保持遙遠的均勢平衡姿態，武力是自衛用的、避免人道干預，也就是獨善其身、顧好北美洲就好 (p.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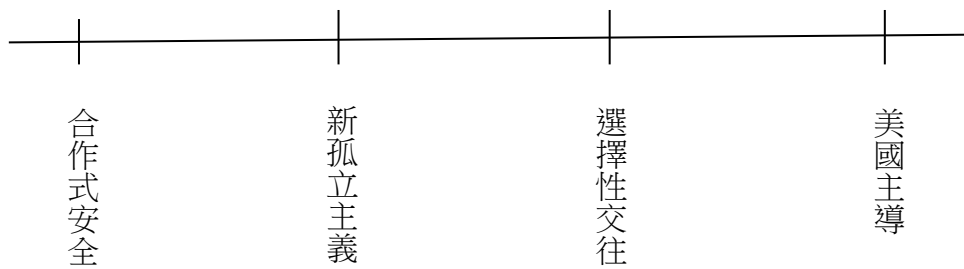


圖 8：Posen 與 Ross 的大戰略願景

我們整理了後冷戰時期美國所採取的大戰略 (施正鋒, 2011: 2010-11)，基本上是依違交往、及圍堵之間，各有自由主義、以及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大體而言，民主黨比較偏好交往、共和黨比較傾向於圍堵。然而，在實際上的運作，

(rollback)。

<sup>22</sup> 相關的用字是優勢、支配 (dominance)、霸權 (hegemony)。

各自還是有微幅調整的空間，而彼此也有交集、相互吸納、甚至於飛象過河，所以不能光憑名稱來判斷政黨立場。譬如交往的大戰略又可以細分為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條件式交往<sup>23</sup>（conditional engagement）、鷹式交往（hawk engagement）、以及脅迫式交往（coercive engagement）；同樣地，在圍堵的大戰略下，可以有威嚇（coercion）、嚇阻、預防性防衛（preventive defense）、以及限制性圍堵<sup>24</sup>等變形（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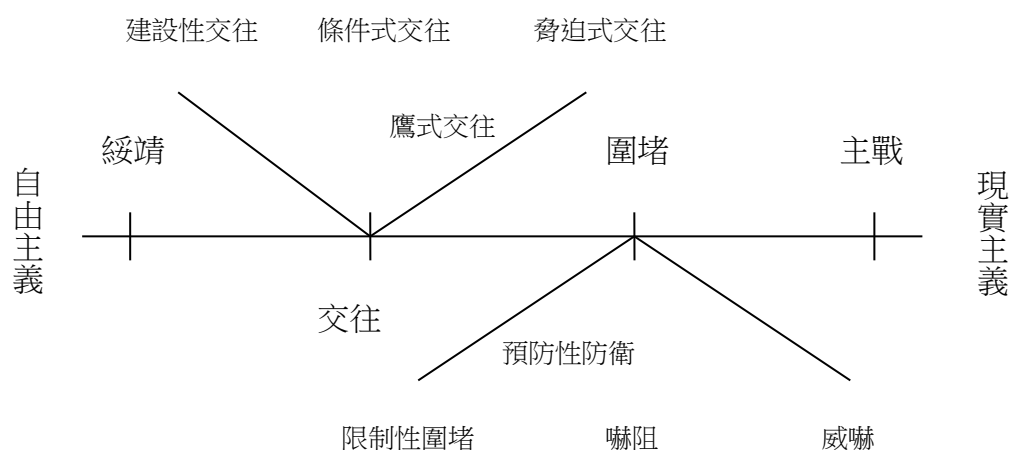


圖 9：美國在後冷戰的大戰略選擇

## 川普是否有大戰略

川普在大選期間，對於現有外交建制（establishment）大加撻伐，誓言上台後一定會帶來大戰略的變革，因此，不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主流策士，既然只有靠邊站的份，對於他是否有完整而一致的大戰略，大體抱著觀望懷疑的態度，甚至於嗤之以鼻（Lissner & Rapp-Hooper, 2018: 19）。誠然，根據 Dombrowski 與 Reich（2017: 1013-21）的觀察，歷來美國新總統上任之際，不管在競選期間有沒有提出一套條理分明的宏圖，多少還是會被抨擊，特別是言行是否會一致；事實上，不管是理念、還是話術<sup>25</sup>，一旦執政，邊做邊修，除了要面對來自國際

<sup>23</sup> 也就是前述選擇性交往、或是有限交往。

<sup>24</sup> Segal（1996）認為交往、以及圍堵已經隨冷戰結束而去，建議採取侷限（constraint）的方式，中國吃硬不吃軟，或許會識實務為英雄，其實也是一種限制性圍堵。

<sup>25</sup> 講好聽稱為論述（discourse），退而求其次叫做修辭或話術（rhetoric），說穿了就是話虎爛。

體系的挑戰，難免囿於外交、以及國防官僚體系的操作性限制<sup>26</sup>（operational constraint），包括制度過程、組織文化、及決策鏈，只要經過校正的戰略（calibrated strategy），往往是延續性多於開創性，看來換湯不換藥。

不管如何，誠如 Brands（2018b: 7-8）所言，所有的國家領導者都必須面對大戰略的抉擇，即使他們或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此，儘管川普看起來沒有家教，對重要議題生疏、憑著直覺判斷、甚至於說變就變，然而，並非無法歸納出一些模式出來。Dombrowski 與 Reich（2017）比較川普的競選語言、以及就職半年後的外交作為，或許昨是今非、甚或前倨後恭，不過，就具體的邊界（移民）管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北韓核武三大課題，分別採取了孤立主義、自由式領導、及美國主導等戰略，儘管語不驚人死不休<sup>27</sup>，未必隨性而行；換句話說，即使他本身有內建的一些基本傾向、及偏好，心直口快、卻又誇張幼稚，不過，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章法，也就是會看情況做不同的戰略回應，相當有彈性而折衷，而且並未偏離前人的作法太多。

縱然外交政策並非美國在 2016 年總統大選的焦點，然而，Lissner 與 Rapp-Hooper（2018: 7-9, 17-18）觀察川普上台一年多的作為，歸納出他老王賣瓜的「美國第一」（American First）主義，基本上是以目中無人的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來定義國家利益，揉合喧嘩的傑克遜式民粹主義（Jacksonian populism），又配合孤獨的牛仔般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再加上生意人斤斤計較的戰術交易主義<sup>28</sup>（tactical transactionalism）風格；大體而言，川普已經棄絕自由式國際主義，也許看起來有一點孤立主義的調調，實際上還是比較接近選擇性交往的大戰略，尚未看出打算通盤從全球各地戰略撤守。Brands（2018b: 12-13）也認為，川普的外交立場鮮明，卻是孤陋寡聞（poorly informed）；身為作為總統候選人，川普像是一條很會叫的狗，相當怕人，不過，當上總統以

---

<sup>26</sup> 限制是中介變數的意思、而非獨立變數。

<sup>27</sup> 譬如他在拜訪歐盟執委會主席（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Jean-Claude Juncker、以及歐盟高峰會總裁（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t）Donald Tusk 之際，為了貿易逆差，口不擇言表示德國人很壞（very bad）（Gilchrist, 2017）。

<sup>28</sup> Stokes（2018: 135）稱為交易式雙邊主義（transactional bilateralism）。



後就比較收斂，反倒是看起來會咬、不會叫。

Brands (2018b: 14-28) 進一步把川普的大戰略觀歸納如下：(一) 以零和的世界觀來看外交，特別是外貿政策，敵視世界貿易組織，認為美國在自自由貿易中老是被佔便宜；(二) 認為盟邦只會搭順風車、把美國當冤大頭、不願意承擔更多的安保的費用<sup>29</sup>，委實划不來，因此希望能視個案討價還價；(三) 以為美國無力在海外推動民主政治、以及人權保障，不願意對威權國家喋喋不休，擔心會損及美國的安全、及榮景；(四) 儘管相信美國還是可以選擇性扮演救火隊的角色，但是自己的全球性領導者地位並非不可或缺，畢竟代價太高，希望德國、或是日本等盟邦能分攤一些工作；(五) 並不關心世界秩序這回事，甚至於沾沾自喜自身的不可預測是操弄的優勢，不分敵友，讓盟邦擔憂美國是否言而有信；(六) 缺乏外交能力，對於基本的課題一知半解，提出一堆不切實際的政策建議，喜歡以即興方式從事政策發展，個性不穩定甚至於火爆，時常跳過國務院及其他重要部門，嚴重打擊政策專業人士；(七) 消耗美國的軟實力，降低外國崇高人士對於美國文化、政治、以及社會的嚮往，破壞美國無私關懷全球事務的印象、以及採取非脅迫性方式達成地緣政治目標。

儘管川普選前夸夸而談、主張在國際事務上少管閒事，然而，Stokes (2018: 134-35) 發現他上台後的作為，其實是大打折扣、並沒有看到改弦更張，甚至於有時候看起來神來一筆，不可能對現有的自由式國際秩序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從事巨幅的結構性調整，畢竟現狀是對美國有利的；因此，作為一個國際體系的維護者，美國或許不再是過去那麼崇高的善良霸主 (*benign hegemon*)，也就是當公共財的成本一直在提高之際，只好自行吸納、補貼小弟，卻也未必像藉機上下其手抽頭的霸主 (*advantaged hegemon*)，但至少是脅迫式霸主 (*coercive hegemon*)，軟硬兼施使用者付費、收取合理的規費 (pp. 134, 138-41)。

---

<sup>29</sup> 川普選後在推特寫著 (Goure, 2016)：

It's possibl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let NATO go. When we're paying and nobody else is really paying, a couple of other countries are, but nobody else is really paying, you feel like the jerk.

## 美國面對挑戰後的大戰略

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一手擘劃的自由式國際秩序下，雖然必須比盟邦付出比較大的代價，畢竟還是最大的受益者。只不過，物極必反，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下，不止帶來國與國之間發展的差距、也造成國內的所得不平等，而川普當選所反映的就是尋常老百姓的嚴重經濟不安全感，質疑美國是否有必要打腫臉充胖子；在過去，因為有蘇聯他者的存在，儘管大家即使有一些歧見，多少還願意為了理念團結在美國的領導下，如今，當眾人對於威脅及安全沒有共識，大哥又看起來好像已經失去理想，如何走得下去（Stokes, 2018: 145-47）？

Clarke 與 Ricketts (2017) 調侃，如果說歐巴馬的作法是「衰退管理」(decline management)，川普則是採取「否認衰退」(decline denial) 的大戰略。不可否認，美國目前的實力大不如前、榮景不再，頂多只能算是普通的超強 (unexceptional superpower)，有時漫不經心；話又說回來，美國畢竟不是紙老虎，儘管俄羅斯、以及中國再如何堅定自信 (assertive)，有事沒事草蜢弄雞公，想要確立區域霸權的地位，譬如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中國耀武揚威南海，未必膽敢螳臂當車稱霸 (Brands, 2018b: 11-16)。

在這空窗期，究竟美國的自我定位是牧師、捐客、還是惡霸？到底川普會採取何種大戰略？由現有自由式霸權為出發點，如果往自由主義調整，可以有 Nye (1995)、以及 Brooks 等人 (2012) 所倡議的深入交往 (deep engagement)，然而，那顯然與川普的外交傾向背道而馳。如果往現實主義稍微移動，也就是 Posen (2014, 2018) 所主張的自我克制，量力而為，不要盲目追求美國主導、或是四處烽火。如果再多一點現實主義，就是 Mearsheimer 與 Walt (2016) 的離岸制衡，平常扮演人形立牌警察就好，稍安勿躁，也就是儘量讓當地的盟邦去圍堵歐洲、波斯灣、以及亞洲的威脅。以亞洲來看，可以看出是結合日本、澳洲、以及印度，不過，不時派海軍到南海宣揚天威是必要的，就像當年老羅斯福總統派遣大白艦隊 (Great White Fleet) 巡弋世界一樣。

## 附錄：對川普的看法

###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對台灣的可能影響\*

出乎選前各家民調的預測，共和黨的川普打敗民主黨的希拉蕊，當選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究竟未來四年對於台灣將會可能產生何種影響？對於抱著維持現狀者而言，由於習慣過去八年來歐巴馬總統的外交走向，勢必重新調適白宮新主人的風格，難免覺得稍有不方便的地方，特別是選前的相互承諾，新政府的外交團隊未必買單。也因此，我們必須客觀地評估川普的可能作為，不要被美國的輿論牽著鼻子走。

就意識形態來看，共和黨籍的總統大體對於中國戒慎小心，因此相對友善台灣，而民主黨籍總統則多半認為中國重於台灣。在這樣的外交大傾向下，國務院官員一向比較同情中國，而五角大廈則比較看得到台灣。儘管如此，如果有更高的全球大戰略考量，譬如在冷戰時期為了對抗蘇聯而與中國結盟，共和黨出身的尼克森也只好放棄台灣；相對地，民主黨的柯林頓跟中國眉來眼去，一旦中國飛彈射向台灣，也不得不派遣海上戰鬥群前來巡弋。

素人出身的川普，雖然口不擇言、講話彷彿膝蓋反射，不過，外交政策還是相當低調，尚未看出通盤的大戰略，只能說相當程度的孤立主義。他不希望美國因為擔任世界警察付出太多的財政負擔，因此要求北約的盟邦能更積極地進行自保，譬如希望德國捍衛烏克蘭，同時也毫不靦腆要對方使用者付費，不脫生意人在商言商的本能。事實上，同樣的說法也出現在川普對日本、以及韓國的國防自主期待，甚至於直言自行發展核武。我們因此可以臆測，要是美國要台灣購買更多的防衛性武器，應該也不意外。

基本上，川普對於經貿議題上著墨較多，譬如認為世界貿易組織（WTO）造成美國人的失業，又威脅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如此強烈的保護主義，讓傳統支持自由貿易的共和黨人相當尷尬。他抨擊最猛烈的是美國的最

---

\* 《台灣時報》社論 2016/11/10

大經濟競爭對手中國，除了指控對方盜竊智慧財產及科技，還操弄匯率、補貼外銷、降低環保標準，造成嚴重貿易赤字、以及國內失業，因此揚言要對對中國產品最高課以 45% 的關稅，以重建美國的製造業，似乎看準中國不敢進行報復。

如果這些不是競選的高調，那些建立在美、中積極交往所建構經貿關係的企業界，當然是毫不掩飾悲觀的態度。我們認為，台灣在馬英九總統任內過度仰賴中國挹注，不管是覬覦其市場、或是轉口外銷，這正是我們痛下決心改善經濟體質的關鍵時刻，此刻要擺脫搶走美國人就業機會的污名，不應該再徘徊觀望。另外，川普也明言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所以，我們更必須把視野更加擴大，不要忽視邦交國所在較多的拉丁美洲。

整體來看，川普對於東亞的安全關注，除了要中國出面約束北韓的核武發展，也誓言增加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能見度，特別是南海，不過，並沒有具體的鋪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美國為了省錢而打算撤出在日本、及韓國的駐軍，要求兩國強化本身的自衛能力，對台灣是否會依樣畫葫蘆？選前，已經有民主黨智庫專家預測，如台灣果預期沒有沖繩駐軍馳援，美國海軍及長程轟炸機不足阻止中國飛彈、或潛艇封鎖，因此可能發展核武。是否危言聳聽，台灣必須未雨綢繆。

## 川普的外交傾向——務實的現實主義\*

川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世界各國忙著嘗試理解他的外交傾向，選前對他不屑一顧的美國學界更不用說，也開始有一些比較深入分析，包括媒體對於國安團隊的可能人選的推測。一般而言，外交不會是大選的重心，除非有重大國際危機出現、或是跟內政有明顯的連結，川普也不例外，在選舉過程沒有太多著墨。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從他早先的電視辯論、四月在華府、以及八月在俄亥俄州的外交演說，初步勾勒大略的圖像。

由於川普語不驚人死不驚，不少觀察家使用不穩定、或是不可預測來描寫川

---

\* 《民報》2016/11/13

普的外交，然而，即使缺乏完整的鋪陳，我們還是可以由他的信念、以及意識形態看出一些端倪。基本上，他的基本價值是「美國至上」(American First)，目標是如何在公平的貿易下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而他的世界觀則是中國未必是敵人、俄羅斯未嘗不可當朋友，比較具體的政策立場是盟邦必須分攤安全的成本，甚至於期待中國、及俄羅斯分別約束北韓、及敘利亞。

就意識形態來看，川普打算重新塑造美國的自我定位，也許圖像還在摸索，至少不會是免費扮演世界警察；儘管他依然重視反恐優先下的國土安全，不過，國家安全已經擴大為經濟安全、貿易的目標是為了國民的經濟福祉；也因此，自由貿易、以及相關的經貿規範，不再至高無上。整體來看，如果說川普將奉行孤立主義，未免過度詮釋；同樣地，如果說自由貿易將會被棄之如敝屣，那也是言過其實；在商言商，將本求利、精打細算，我們暫且稱為「務實的現實主義」。

假設中國無意、俄羅斯無力挑戰美國，那麼，未來的國際體系將會是三巨頭(troika)的結構，打破美國獨霸的局勢；除非中、俄決心聯手對抗美國，川普應該會把涉外重心放在經貿規則的調整。既然全球性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難以進展，而區域性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則造成內部分配不均，連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又裹足不前的話，那是不可想像；不過，比較具體的經貿政策，還有待發展。

就一個非華府圈內人而言，川普毫不掩飾對於現有體制、及規範嫌惡，包括美國戰後所倡議的國際經濟體制，冷戰結束後的美國角色、以及九一一以後美國的全球大戰略。他不只是對於高舉自由主義的民主黨專家嗤之以鼻，跟主張新保守主義的共和黨策士也是格格不入，因此，連共和黨的國安、外交人員都連署拒絕背書(包括小布希的國務次卿阿米塔吉)。當然，不少選舉語言是為了吸引特定對象，川普儘管強烈抨擊現任總統的作為，未必代表自己上台就會改弦更張。

由於是全面執政，川普比較不用擔心民主黨在國會的立法掣肘。由於他在競選期間高舉反體制的大旗，不信任既有的政治菁英，尤其是華府的圈內人，因此，傳聞中的國安人事安排，包括國務卿、家安全顧問、以及國防部長等等，比較有

可能任命選舉出身的政治人物，特別是前參眾議員、或是州長，用來駕馭官僚體系及文武百官。話又說回來，由於希拉蕊的普選票稍多，國內抗議聲音不斷，尤其是東、西兩岸，短期內，川普應該會先致力於處理社會分歧。

就動機來看，川普顯現相當強烈的權力慾、而且看來也願意付出心血，因此，至少會比前幾任總統勇於任事。就個性而言，心理學家對他的剖繪是相當自戀；不過，由於缺乏涉外事務的經驗，川普除了大方向的直覺，仰賴閣員提供細部的建言。就風格來看，究竟他會主導決策、或充分授權，還有待觀察；如果是後者，一旦內閣成員確定，他們將會有比較多的影響力。如果川普堅拒檯面上的外交菁英，即使變數較大，卻有比較大的想像空間；要是演出鳳還巢，被嘲諷為散兵游勇的國王人馬也未必會言聽計從，我們也有突破的機會，特別是強調自衛能力的強化，總比被視為理所當然好。

## 對於川普現象保持樂觀，卻要維持自主\*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真的是言人所不敢言，競選期間對於中國已經有種種抱怨，就因為一通來自台灣總統蔡英文的道賀電話，不悅對方頤指氣使，連續推了幾篇短文跟中國嗆聲。在台灣方面，國人自然相當興奮，畢竟，這是美國在三十七年前跟中華民國斷交以來，首度有這樣高層級的通話，更不用說，川普的再三發言大大提高台灣的能見度，這樣的國際宣傳效應，完全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不過，由總統候選人、當選人、到正式就職，川普的對台政策還是有待觀察。

我們知道，戰後以來的共和黨籍美國總統，自來對於中國戒慎小心、對於台灣比較友善，相對之下，民主黨籍總統比較喜歡跟中國交好、認為台灣是燙手山芋。儘管如此，在國家利益的考量下，還是會把國家安全作為最高的指標，因此，即使韓戰時期的杜魯門、及台灣首度總統直選時的柯林頓都是民主黨的總統，還是不得不作出對台灣有利的決策；同樣地，共和黨籍的尼克森、及小布希看來友

---

\* 《台灣時報》社論 2016/12/17

台，終究還是認為台灣是可以讓步的。

自從冷戰結束，美國作為國際體系的獨霸，顧盼自雄，卻有點不知道要如何面對全球化後的國際社會，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焦頭爛額，讓韜光養晦的中國漸漸走出天安門事件的陰霾、趁勢崛起。川普所代表的是反對兩黨在外交思維上的惰性，亦即對於中國的容忍，尤其是這時候的美國已經沒有必要仰賴對抗蘇聯，自然睥睨墨守成規者，一再揚言巨幅的改弦更張。在這樣的氛圍下，原本語不驚人死不驚的川普一語道破前人的偽善，自是大快人心。

到目前為止，民進黨政府小心翼翼，官方的說法是「兩岸與台美關係一樣重要」，顯然不願意被指控是破壞現狀者；同樣地，中國到目前為止還在觀察川普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既然川普有意打破現有的框架、挑戰長期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一些所謂常規，我們應該有所積極的作為，趁機向世人揭露諸多不合理的限制，尤其是中國的蠻橫打壓，譬如把台灣當作他們的一個省分。坦誠而言，我們如果自己不出聲，見義勇為的國際友人勢必自討沒趣，包括川普。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川普畢竟是美國總統，一切決策以美國為優先，如果台灣的利益剛好不抵觸，雙方當然有相互強化的效果；要是彼此有矛盾的地方，一定毫不猶豫，我們不應該有過度美化的期待。事實上，川普自己也明言，要是中國不能在貿易等議題讓步，美國沒有必要接受「一個中國」的束縛，說穿了，台灣還是強權討價還價的籌碼。如果說以「一中政策」來跟中國虛與委蛇者是偽君子，只要價碼談得攏，難保不會看到接受「一中原則」的真小人。

令人擔憂的是，總統府資政吳澧培公開表示不反對「美國把台灣當作棋子、當作籌碼壓迫中國」。面對強國威脅，除非可以使用核武嚇阻，尋求結盟是合理的選項。然而，如果自願充當別人的馬前卒，那是匪夷所思，畢竟，被驅策的卒子只能過河、沒有回頭，當人家的籌碼只能被贏來贏去，完全沒有自主可言。台灣人歷經異族統治，終於覺悟必須有自己的國家，差異在如何達成目標；如果貿然投懷送抱、飲鴆止渴，那不只是不智、甚至於是可恥。

## 由腹語、唇語、到白話\*

最近，美國人好像流行「講真話」的遊戲，只不過，真心話往往是傷人的。首先是總統當選人川普再三推文向中國噏聲，讓不少台灣人喜出望外，甚至於有自甘馬前卒者。緊接者，即將下台的歐巴馬總統也不甘寂寞，一反過去八年來對台灣視若無睹的態度，忽然發現自己是台灣人的代言人。相對之下，中國相當地低調，只讓尾巴傳聲筒出來叫囂一番；同樣地，台灣政府似乎有點尷尬，彷彿不知道要如何回應才好。

指出國王新衣的是川普，他在跟蔡英文通過道賀當選的電話後，老大不高興地說：「Interesting how the U.S. sells Taiwan billions of dollars of military equipment but I should not accept a congratulatory call.」。川普雖是大老粗，罵人還是拐灣抹角。他的意思翻譯成白話就是：有夠笑虧（你是住在海邊嗎、騙崗e、管恁爸那麼多），台灣是我們的大客戶，竟然連打個電話恭喜一下，也不可以嗎？

當川普讀出偽君子的唇語，歐巴馬只好說出美國對台灣現狀的認知：「(儘管)中國認為台灣是其一部份，(台灣卻)是具自行其道的實體」(China had recognized Taiwan was its own entity that did things its own way,.....)。不過，最具殺傷力的是句子的後半段：「台灣同意，只要有某種程度的自治，就不會宣佈獨立」(while Taiwan had agreed that, with some autonomy, it would not declare independence.)。套用歐巴馬的邏輯，黑人只要有棉花（自治）可以採，就會乖乖地當奴隸（不要獨立），反正，在南方當農奴（中國的）與到北方當工奴（美國的）差不多。

或許有人會很高興，因為歐巴馬說：「儘管現狀不能完全滿足各方，至少維持了和平，也讓台灣人有相當成功的經濟、同時享有高度的自決」(That status quo, although not completely satisfactory to any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has kept the peace and allowed the Taiwanese to be a pretty successful ... economy and a people who have a high degree of self-determination.)。問題是，他又沒有問台灣人的意願，憑

---

\* 《民報》2016/12/19



什麼就可以送做堆？要知道，這已經不是 1945 年的時代了，此番，台灣人不接受強權私相授受了。

不管中國終究要將台灣納入、還是暫且當作藩屬，中國的「一國兩制」其實就是港澳化，而所謂的「高度自治」就是沒有一點自主，儘管修辭漂亮，看看圖博（西藏）的命運就好。相對之下，美國將近四十年來，把台灣當作比關島還不如，連買武器自衛都要看人臉色。事實上，半個世紀以來，一些馬屁精中國通頤指氣使，台灣人忍氣吞聲。終於，川普大快人心道破腹語，不願意再接受那些 panda hugger、以及國務院裡頭 cookie pusher 的氣了。

所謂的現狀，就是美國把台灣當作禁燴（勢力範圍），既不願中國染指、又不願意台灣自主。講好聽一點，台灣是美國制約中國的一環，講不好聽一點，台灣只是人家談判的籌碼，沒有任何自主性。當美、中兩者如膠如漆，台灣是不方便的電燈泡，不要想要左右逢源；當兩者翻臉的時候，也不過是任憑呼喚的小弟，叫立正、不敢稍息，毫無尊嚴可言。難道台灣人就沒有其他的選項，只能看人臉色、任人宰割？

關鍵於台灣人自己。我們看到，一些綠營政客跟策士還在學舌不要挑釁中國、堅持維持現狀，太沒有骨氣了吧！我們真的就安於現狀——中華民國式的獨立，也就是所謂的「華獨」？明明是人，偏偏要自我矮化為妖，說什麼妖就是人、人就是妖？表面上是既人又妖，實際上是不人不妖！難怪，歐巴馬會嘲笑說，給他們一塊人皮貼在臉上就好，這些傢伙不會真的想要當人。

## 川普與習近平高峰會議的初步觀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六日訪問美國，與新上任的總統川普首度進行高峰會議。由於會議還在進行中，尚未有正式的記者會、或共同聲明，不過，國際上已經有各種分析，而國內也有不同立場的揣測，特別是兩國之間有無可能出現第四

---

\* 《台灣時報》社論 2017/4/9。

份公報。儘管台灣此刻並非美、中競逐的焦點，萬一雙方忘情演出，尤其是新手上路的川普，難免把台灣當作人情私相授受。與因此，不僅總統蔡英文召集國安幕僚瞭解情勢，連行政院長林全也出奇發言，表示企盼美中台維持穩定關係。

川普商人從政，雖然行事風格不按牌理出牌，然而，他對於體制內的兩黨共識頗不以為然，再加上相當程度的鷹派觀點，觀察家大致上認為川普的涉外事務會比歐巴馬積極。換句話說，儘管他選前一再釋出孤立主義的語言，特別是對於TPP嗤之以鼻，只不過，即使新政府意欲把精力聚焦在內政，尤其是產業的回流及振興，卻不能忽視美國作為超強的角色。事實上，美國雖然把敘利亞當作俄羅斯的勢力範圍，老大哥還是無法卸責，終究出手摧毀生化武器基地。

就立即的目標而言，由於北韓不顧國際上的規範、一再對外發射導彈飛彈，不僅引起南韓、以及日本的不安，連兩國的盟邦美國對於朝鮮半島的情勢也十分頭痛，三國在上個月還共同出動神盾艦、進行反彈道飛彈聯合演習。在川習會之前，北韓又朝日本海發射飛彈，挑釁的意圖甚明；事實上，南韓堅持部署美國的薩德飛彈防禦系統（THAAD），至少可以解釋為反制北韓。只不過，項莊舞劍，飛彈是隨時可以調整方向的，因此，中國勢必交代將如何約束北韓這個附庸。

相較於川普有下馬威的意圖，習近平則有鞏固權力的要務，尤其是即將來臨的重頭戲十九大，因此，川普大動作摩拳擦掌雖非虛張聲勢，卻也未必要認為掌風的真正對象是自己。其實，安內攘外是所有領導者服膺的基本原則，不管是面對保守勢力負隅頑抗、或是持續中國的經濟發展，習近平都需要穩定的外部環境，況且，作為一個崛起的強權，中國還沒有強到要跟美國一爭長短的地步。也因此，儘管中國近年來亟欲擴張南海，與美國軍方時有擦撞，實質受挫的是解放軍。

有關於台灣，作為政治素人的川普並不清楚「一中政策」與「一中原則」的差別，難免用字不精確，只不過，上台後已經回到各說各話的軌道，我們沒有必要過度悲觀。話又說回來，由於川普的國安團隊還在磨合，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幕僚尚待補齊，也因此，我們也不能因為川蔡通話而有太不切實際的期待，畢竟，美國的外交決策還是取決於國家利益。在商言商，川普當然不會放棄把台灣當作

籌碼的可能，問題在於究竟可以換到什麼、以及是否得不償失。

站在台灣的立場，中國是戰後以來最大的安全威脅，毋庸置疑，討好敵人是自取其辱。相對地，美國在戰後一直是我們最堅定的友人，卻不要忘了，反共的尼克森當年為了跟中國建交竟然揮手而去，雖然留下一紙『台灣關係法』，卻掩藏不了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國際現實。國內有人表示寧願當美國的棋子，說穿了就是人家的馬前卒，不足為訓。天助自助，唯有充分的國防能力，才能避免自取其辱、招惹是非。

## 參考文獻

- 施正鋒，2011。《台灣涉外關係》。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施正鋒，2015。《思考台灣外交大戰略》。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維基百科，2018。〈大戰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大战略>) (2018/10/18)。
- Art, Robert J. 2003.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erindan, Ion. 2016. “On Grand Strategy: A Systemic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ISS – ISA Meeting, Ljubljana, June 25 (<http://web.isanet.org/Web/Conferences/CEEISA-ISA-LBJ2016/Archive/c55ac835-d490-4435-a3a3-d40e8785651f.pdf>) (2018/10/21)
- Brads, Hal. 2018a.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rump*.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Brads, Hal. 2018b. “The Unexceptional Superpower: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rump.” *Survival*, Vol. 59, No. 6, pp. 7-40.
- Brooks, Stephen G.,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12.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3, pp. 7-51.
- Brown, Michael E.,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1997.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uzan, Barry. 1987.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larke, Michael, and Anthony Ricketts. 2017. “US Grand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ilemmas of Primacy, Decline and Denial.”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us-grand-strategy-national-security-dilemmas-primacy-decline-denial/>) (2018/11/2)
- Cooper, Richard N. 1972-73. “Trade Policy I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No. 9, pp. 18-35.
- Dombrowski, Peter, and Simon Reich. 2017. “Does Donald Trump Have a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3, No. 5, pp. 1013-37.
- Dueck, Colin. 2004. “New Perspective o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4, pp. 197-216.
- Gilchrist, Karen. 2017. “Trump Reportedly Calls Germans ‘Very Bad,’ Threatens to End German Car Sales.” CNBC, May 26 (<https://www.cnbc.com/2017/05/26/trump-calls-germans-very-bad-threatens-to-end-german-car-sales-reports.html>) (2018/10/31)
- Goldstein, Avery. 2003. “An Emerging China’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pp. 57-10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oure, Dan. 2016. “Will President Trump Renegotiate The NATO Treaty?”

- National Interests*, December 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will-president-trump-renegotiate-the-nato-treaty-18647>) (2018/10/31)
- Gray, Colin S. 1982.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Gurtov, Mel. 2006. *Superpower on Crusade: The Bush Doctrine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 Gurtov, Mel, and Peter Van Ness, eds. 2005. *Confronting the Bush Doctrine: Critical Views from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Huntinton, Samuel P. 1991. "The Evolution of U.S. National Strategy," in Daniel J. Kaufman, David S. Clark, and Kevin P. Scheehan, eds.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1990s*, pp. 11-18.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2005. "Power and Liberal Order: America's Postwar World Order in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Vol. 5, No. 2, pp. 133-52.
- Joffe, Josef. 1984. "Europe's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Policy*, No. 54, pp. 64-82.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1999. "Realism(s) and Chinese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Cold Period,"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pp. 261-31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C.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ufman, Daniel J., David S. Clark, and Kevin P. Scheehan. 1991a. "Introduction," in Daniel J. Kaufman, David S. Clark, and Kevin P. Scheehan, eds.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1990s*, pp. 1-7.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and Nobuo Okawara. 2001. "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pp. 153-85.
- Kitchen, Nicholas. 2010. "Systemic Pressure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6, No. 1, pp. 117-43.
- Kupchan, Charles A. 2002.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Layne, Christopher. 1998.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Hegemony or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5, No. 2, pp. 8-28.
- Legro, Jeffrey W. 2005. *Rethinking the World: 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ddell Hart, B. H. 1976. *Strategy*, 2<sup>nd</sup> ed. London: Faber & Faber.
- Lieber, Robert J., ed. 1997. *Eagle Adrif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Longman.
- Lissner, Rebecca Friedman, and Mira Rapp-Hooper. 2018. "The Day after Trump: American Strategy for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1, No. 1, pp. 7-25.
- Lynn-Jones, Sean M., and Stevens E. Miller, eds. 1992. *America's Strategy in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J., and Stephen M. Walt. 2016.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4, pp. 70-83.
-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NSSA). 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http://nssarchive.us/>) (2018/10/18)
- Nau, Henry R. 2002. *At Hom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Nerlich, Uwe. 1979. "Wester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aedalus*, Vol. 108, No. 1, pp. 87-111.
- Nye, Joseph S. 1995.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pp. 90-102.
- Oye, Kenneth A., Robert J. Lieber, and Donald Rothch, eds. 1983. *Eagle Defiant: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Boston: Little, Brown.
- Posen, Barry R. 2014.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osen, Barry R. 2018.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Trump's Surprising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2, pp. 20-27.
- Posen, Barry R., and Andrew L. Ross. 1996-97.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pp. 5-53.
- Segal, Gerald. 1996.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pp. 107-35.
- Silove, Nina. 2017. "Beyond the Buzzword: The Three Meanings of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Vol. 27, No. 1, pp. 27-57.
- Stokes, Dog. 2018. "Trump,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pp. 133-50.
- Von Clausewitz, Carl. 1968. *On War*. London: Penguin Books.
- Walt, Stephen M. 2002.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White House. 198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87) (<http://nssarchive.us/NSSR/1987.pdf>) (2018/10/18)
- White Hous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2018/10/18)

Wikipedia. 2018. "Grand Strateg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and\\_strategy](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and_strategy))

(2018/10/18)

Wikipedia. 201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United Sta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United\\_States\)](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United_States)))

(2018/10/18)